解放战争时期凯里党小组的革命活动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凯里党小组在抗日战争期间，尽管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们始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维护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高举民族团结的大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坚持与顽固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并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一节 贯彻落实中共南方局指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及时了解和掌握中共中央关于白区工作的方针。1946年6月，凯里党小组派李长青到重庆寻找上级组织。由于从炉山到重庆路途遥远，李长青便卖掉了银锭加工过程中所得到的1400斤铜，用得到的钱作为路费。他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终于到达重庆，找到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原八路军驻贵阳交通站负责人袁超俊。袁超俊向李长青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要求凯里党小组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将党的宣传工作对象侧重于群众中有职业有地位的人物，利用公开刊物、报纸、集会，批评时政，宣传、发动和引导群众，增强群众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和对解放区的了解。李长青返回贵州后，及时将中央的精神分别向凯里党小组成员作了传达。

为了贯彻中央的工作指示，同年冬，李长青来到西江，他与当地青年杨光文对西江的社会文化现状进行调查了解，发现苗族聚居区的文化教育相当落后，严重影响和阻碍了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尤其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为发展山区文化，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加强我党方针政策的宣传，他计划在西江建立中学。为使办学工作能够得到各方的支持和响应，李长青组织当地青年积极分子对办校工作进行广泛宣传。办学的消息传开后，社会各界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有的捐钱捐米，有的为建校提供木料和书桌凳子。然而，正当学校创办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国民党雷山当局以进行“异党活动”的罪名，逮捕了杨光文等人，办学工作因此被迫停止。当杨光文等被押经凯里时，李长青曾设法营救，但由于国民党当局对被捕人员看管得很严，营救未能取得成功。

1947年8月，李长青赴贵阳与《贵阳力报》总编、进步青年顾希均见面。顾希均，炉山县凯棠乡人，自幼勤奋好学，少年时就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社会的黑暗疾恶如仇，且十分同情贫苦农民。为寻求真理，他走出家门，先后到湖南省邵阳《力报》社和衡阳《力报》社工作，因经常发表抨击时政的文章，遭到敌特监视，后被迫离开湖南返回贵州。1947年6月，顾希均到贵阳《力报》社工作。不久，李长青找到顾希均。李长青把中共中央关于白区工作的方针向顾希均作了宣传，顾希均听后很受鼓舞。他们秘密商定利用《力报》揭露官僚、军阀、买办资本家等的腐败，真实反映广大民众的呼声与要求，传播中共的方针、政策及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同时，他们还秘密商议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由于顾希均在所办的报纸上发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战场七月如流火》《从京沪各报消息看最近战况》等文章，真实地反映和阐述了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的破产，尤其是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情况，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度恐慌和愤怒。9月，顾希均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李长青与他商定的开展武装斗争的计划也被迫搁置。顾希均被捕后，在狱中仍继续坚持与敌人斗争。1949年11月11日，贵阳解放前夕，残忍的国民党特务将顾希均与其他23位革命青年杀害于贵阳纪念塔附近的马家坡，顾希均牺牲时年仅28岁，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双十一”惨案。不久，贵州省委、省政府追认顾希均为革命烈士。

同年，曾给予凯里党小组革命工作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唐寿南，也因病在贵阳逝世。唐寿南虽为党外人士，但他思想进步，积极参与革命斗争，经常无私地在生活上、工作上帮助李光庭、王毅、喻雷等共产党人。早在1943年，冯治安独吞荣通酒精厂的资产后，李光庭、喻雷生活十分困难，李光庭每次去贵阳，唐寿南都解囊相助，虽馈赠不多，但算是雪中送炭亦可维持三五个月的生活。后来，李光庭开设的客栈入不敷出，唐寿南也多次出资相助，使凯里党小组的革命活动得以坚持开展下去。唐寿南的逝世对于凯里党小组的革命工作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第二节 组织民众抗兵役抗交粮

随着抗日战争结束，人民群众期望所负担的兵役及粮赋能得以减少，生活能得到逐步改善。但是，国民党当局为了发动内战，对兵役及粮赋采取明减暗增的办法，继续对人民群众进行压榨。1946年，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发布训令，免征炉山县田赋一年，分别于1946和1947年各减征一半，军粮实行“征一借一”办法进行征缴。当年，全县完成各种征粮共计14563石，1947年完成15017石，虽然比1945年分别减少44.48%和45.87%。但由于此前支援抗战，加上地主的盘剥，全县各族群众已是极度贫困，尚未得到休养生息，根本承受不了如此重负。兵役方面，国民党当局不从实际出发，分摊的征兵任务数远远超出了炉山全县兵源的承受能力。征兵人员在征兵过程中还徇私舞弊、贪污受贿，不按规定程序办事。他们将“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征兵规定改为不论兄弟多少而强捆硬拉，有钱有势的通过缴纳免役、缓役金可免役或缓役，空缺出来的名额又分摊到群众头上，由此一来，不少家庭青壮年男子被全部抓走，实在不够数的情况下，年老的也抓去凑数，最终弄得老百姓家庭支离破碎，生活困苦不堪。

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全国兴起。凯里党小组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在人民群众中的先锋队作用，利用各种机会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征兵、征粮人员贪赃枉法行为。国民党凯里镇镇长毛文藻与大地主蒋文斌相勾结，企图贪污购米经费，把购买军米的负担分摊给贫苦百姓。他们的这一阴谋，被李长青安插在凯里镇的孙礼庸获知。孙礼庸及时将这一情报向李长青作了汇报。党小组迅速组织人员将毛文藻与蒋文斌的阴谋在凯里和清平两地传开，并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在清平和凯里举行了几次声势较大的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炉山县政府免除穷苦农民大包军米的任务，改由有田有地的大富人家承担。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和抗议下，国民党炉山县政府被迫作出让步。

毛文藻和蒋文斌由于完不成上交大包军米的任务，遭到县政府官员训斥后，便把怒火撒到了孙礼庸的身上。他们把孙礼庸关押起来，对他进行刑训。面对毛文藻、蒋文斌的威逼，孙礼庸毫不畏惧，继续揭露他们的阴谋，坚持与他们斗争。与此同时，当得知孙礼庸被毛文藻、蒋文斌抓起来后，李长青又组织群众到镇公所请愿，要求无条件释放孙礼庸。毛文藻、蒋文斌自知理亏，并迫于群众的压力，在将孙礼庸关押了4天后，不得已将其释放。在这一斗争胜利的鼓舞下，凯里附近板溪的苗族群众拿起自制武器，组成护寨队，不准征兵征粮人员进寨，成了不服国民党炉山县政府管理的“独立保”。同年冬，炉山县政府命令实行随赋代征保安警察队、公务人员和教员公粮，并规定田赋征收和军粮征借一律征银圆，一银圆抵1.5斗粮，限期5日内完成。可是，由于当年全县有9个乡遭受特大水灾，减产5至7成，许多农民因无法交纳公粮款而被捕入狱。凯里党小组为解救被关押的贫苦农民，广泛发动民众进行了抵制和反抗，使国民党炉山县政府最后不得不将被捕的贫苦农民全部释放。

由于李光庭、李长青领导群众开展抗兵抗粮的斗争，毛文藻和蒋文斌对李光庭、李长青恨之入骨，遂联名向国民党炉山县政府控告他们搞共党活动。时逢县长陈樵孙被抽调到黄平飞机场工作，由县政府主任秘书孙鸿涛代行县长职务。孙鸿涛接到诉状后，反问毛文藻和蒋文斌：“你们控告李光庭和李长青搞‘共党’活动，他们把你家的田土分给谁了？”毛文藻和蒋文斌无言以对，孙鸿涛就以《六法全书》中“未遂”一条之规定作应付，毛文藻和蒋文斌的控告碰壁，只好灰溜溜地返回凯里。**（未完待续）**

（凯里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杨金科 撰稿）

节选自《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凯里市历史》

香炉山

我的两次高考

○ 李育蒙

即使到现在，距离我的高考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仍然会被一些高考有关的话题，打开尘封的记忆。

说到高考，我并不算成功者。本以为成绩平时还不错，考一个二本院校问题不大。第一次高考，失利了。第二次高考，成绩虽然不是特别特别理想，但还是去了一个不错的院校。我很感激那段时光，感激那时候没有放弃的自己。

曾经，侄子高考之前特意问过我，高考意味着什么？其实面对侄子之问，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每一年莘莘学子奔赴高考，战酷暑抵严寒，奋力拼搏，为的是什么？不就是结实更宽广的世界吗？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和侄子说的是，高考意味着“最好的时光”。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并没有去成名校，但这丝毫不能否认我为之付出的努力。高考于我而言，就是最好的时光，有些事是值得为之奋斗几次的。那些因为高考而带来的不同际遇，才成就了当下我的人生轨迹。

第一次高考，成绩很不理想。清楚地记得，在出成绩的当晚，我并没有接到班主任的电话，那其实已经意味着最起码没有上二本线。三年的努力，没有换来想要的成果，那一晚我没有睡下，也不敢给远在外地打工的父母打电话。第二天父亲的电话打来，我只是轻声地说了一句“没考上”。“额，复读吗？”电话那头，父亲的话语很平和。“不了，我怕再考不上。”“那你也出来打工吧！车票我给你买。”就这样简简单单，我们就挂完了电话。

班主任虽然联系了我，但我没有去学校填报志愿，而是坐上了去深圳打工的长途班车，在父亲工友的帮助下，进入了一家台资工厂给手机外壳喷油漆。

工厂里刺鼻的气味，轰鸣的机器，开始让我很不适应。坚持了一段时间，每天手脚都是一抹黑，人整整消瘦了10来斤。以前总觉得高三苦，比起这来，幸福多了。

班主任打来电话，强烈要求我返校复读，说要不然太可惜了。父亲在忙完了加班后，也来到我在的工厂，还是很平和地和我说：“额，复读吗？”“嗯，过两天我就回去。”父亲的意愿其实我是懂得，作为农民工，他知道通过读书跃出农门的重要。让我来打工，也只是想让我切身感受一下他们的处境，更加坚定我通过读书走出去的信心。

父亲的良苦用心和班主任的鼓励，让我重拾了再次走进高三的勇气。尤其是暑假打工的境遇，更坚定了我重新入学的信心。复读高三，我比第一个高三更加刻苦，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更多，这一阶段的经历，收获了耐心和历练，也让我的心态更加冷静、成熟。

转眼，第二年高三，父亲居然破天荒请假回来了。进考场前，远远的我望着他站在家长人群中，跑了过去，父亲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放宽心态，好好考”！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的这轻轻一拍，我感受到了无穷的力量。

高考过后，我再次走进了工厂，这一次是暑期工，因为很自信能考上。果然，出成绩的当晚，我接到了班主任的电话，向我表达了祝贺。之后，我走进大学，念完研究生，到现在在这座城市立足，这一切都是高考带来的改变，如果当初不是选择第二次经历，或许我的人生轨迹，也会淹没在这进城潮流中。

下司龙舟赛

（通讯员 苏志平 摄）

端午是首抒情诗

○马亚伟

每至端午，人们用粽子、龙舟、菖蒲、艾草、白芷、雄黄酒等，把节日演绎得风生水起。

作家汪曾祺说，民俗，是一首民族的集体抒情诗。我以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比喻。一个人，不管平日里多么单调和乏味，到了某一个节日，他就会变得优雅和浪漫起来，连脚步都会放慢许多。我们中国的节日，多得像春花，此开彼落，点缀着平淡的生活。因为有了这些节日，日子便活色生香了。端午节，调动了我们所有的智慧和想象，这首抒情诗，深情而真挚，丰富而浪漫，热烈而温馨。

端午节的习俗各地不一，但是端午节吃粽子，古往今来，各地相同。吃粽子的习俗，是为了纪念屈原。作为诗人的屈原，是中国文人精神血脉的源头。台湾诗人余光中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汨罗江水，使锦绣中华的璀璨诗篇，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不知多少仁人志士有着挥之不去的“屈原情结”。据说，屈原投汨罗江后，百姓们怕江河里的鱼吃掉他的身体，就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以免鱼虾糟蹋屈原的尸体，后来就成了吃粽子的习俗。唐代文秀《端午》诗说：“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记得很小的时候，母亲一边包粽子，一边给我们讲屈原的故事。小半天工夫，粽子熟了，剥开一个尝尝，粽香四溢，绵软可口，真好吃。一边吃着粽子，还感动着屈原的故事。其实，很多故事和民俗，都是在厨房里，被母亲们代代相传的。

吃粽子的习俗延续至今，已经演绎出了异彩纷呈的“粽子文化”，现在的粽子花样翻新，做法各异。而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对粽子源头的解读。这里面，有我们民族最为真挚的爱国情感，也是我们民族善良坚韧和深情厚谊的体现。自古以来，我们就把那些舍生取义的人作为我们的精神向导，这一点体现在很多民俗的细节里，我们的心灵也因此纯净而丰盈。

另外，端午节很多地方有赛龙舟的活动，也是为了纪念屈原。

端午节，又称重五，所以许多习俗也与“五”这个数字联系在一起。有的地方有吃“五黄”的习俗，五黄指黄瓜、黄鳝、黄鱼、咸鸭蛋黄、雄黄酒。记得汪曾祺的散文《端午的鸭蛋》中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顿时，我的口水就下来一大串。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家乡的眷恋，端午，留下了多少美好诗意的记忆啊！

端午节，有的地方要插“五端”，“五端”指菖蒲、艾草、石榴花、蒜头、龙船花，用来驱毒祈福。儿童们要佩带香囊，用红、黄、蓝、黑、白五色丝线，系在脖项、手腕或足踝上，里面装着芳香药物，以祛五毒。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一种祈愿。

艾草摇曳，粽叶飘香，龙舟待发……端午节，从两千多年前的岁月之河上款款而来，抒情诗一般深情热烈。行走在生活的韵脚上，让美好的主题绵延而去，留下一页页难忘的篇章。